# 「歷史與國關」專刊序

中國大陸的國力快速崛起，改變了國際體系的結構，也引發了美中之間的霸權競爭，影響及於全世界。在國際關係的理論當中，以霸權與挑戰者之間是否會產生戰爭爲研究焦點的「霸權轉移理論」成爲顯學，而透過歷史來檢驗霸權戰爭理論的「歷史與國關」途徑也因勢而起，其中最有名的論述便是以古希臘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爭霸來看當今美中競爭的「修昔底德陷阱」。在這樣的學術潮流之下，國內的歷史與國關研究也逐漸獲得重視，特別是由於造成國際體系變動的主因是中國的再起，而臺灣的研究者在語言、文化與學術訓練上具有探索此一現象的相對優勢，因此吸引了許多學者相繼投入，成爲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要次領域。本期的《政治科學論叢》便以歷史與國關作爲主題。

國際關係的理論門派眾多，但是歷史最悠久、影響最深遠的首推現實主義。以現實主義來解釋國際關係具有假設清晰、邏輯精簡的好處，但是也有一些顯著的不足之處。例如第一、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是現實主義分析的起點，但是爲什麼各國的國力會有差距、同一國家的國力在不同時間又變動甚大，這些均非現實主義本身所能夠解釋，成爲一種「外生變項」。第二、同樣在現實主義的範疇之內，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論認爲均勢是維持和平的首要條件，而權力轉移理論卻認爲新興強權的國力接近現狀霸權時最容易引起戰端，現實主義各家間顯有頗大的爭議。最後，雖然權力的因素很重要，但是文化與認同是否能夠發揮重大的影響力，與權力一起發生作用，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

本專刊的三篇論文，分別處理上述的三個問題，並用歷史的案例，推進了理論的前沿。首先，有關於國力興衰的問題，薛健吾在〈爲什麼統一天下的是秦國？「歷史制度主義」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補充」〉中，解答爲何是秦國併吞六國，統一了天下，開創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他主張問題的核心在變法才能強國，而秦是戰國七雄中唯一變法成功的國家，故能一統天下。秦能變法的原因在於其建國的過程與六國在「關鍵轉折」處有初始差異，即秦不出於西周的嫡系或功臣，而是邊緣的諸侯，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並沒有承襲嚴謹的西周封建制度，也沒有根深蒂固的土地貴族。同時因爲受命在邊地對抗蠻族，因此秦的貴族有尚戰功的傳統，而有功績制的特色。變法時引入的土地改革與軍功制使得在「耕」與「戰」上表現優異的平民得以躋身貴族，這在六國受到公室貴族極大的排斥，但是秦的貴族卻由於上述的歷史原因而較能夠接受富國強兵的變法。由於變法在秦獲得了成功的推廣，因而大大增強了國力，奠定了統一天下的基礎。這樣看來，歷史上的關鍵節點影響到了制度的變遷，從而決定了國力興衰與天下局勢。這個理論對作爲現實主義初始條件的國力分配提供了一個歷史制度論的解釋，從而擴充了現實主義的範圍，具有很大的新意。

在〈從攻勢到守勢：權力平衡、觀念轉變與澶淵之盟〉中，唐欣偉解釋了爲何於 11 世紀到 12 世紀初，在既有霸權的遼與新興強權的北宋之間，可以出現長達百一十年的和平局面。遼宋相爭是極爲自然的，雙方在當時都是具有逐霸勢力的強權，而他們之間也爆發了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一連串慘烈戰爭，使得各自受創深重，這是權力轉移理論所預言的。不過，根據杰維斯所提出的學習理論，在國際關係的安全困境下，各國可能因爲在具體事件中受到重大的經驗教訓，從而改變其敵對行爲，而產生合作的現象。對遼而言，不僅戰爭損失太大，得不償失，而且過去統治的經驗顯示漢地難治，佔領的成本極高，而早有不再征服宋地的想法。對宋而言，規復幽雲是其立國時的初心大願，所以宋太宗才會兩次北伐，但先敗於高梁河，再敗於岐溝關，於是弭兵主和之議大興，在主張「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的宋眞宗即位後，乃與遼達成了澶淵之盟。遼宋之間從爭霸戰爭到百年和平，中間所經歷的是從事件、教訓，到未來行爲的學習過程，也就是雙方的均勢在互動中獲得了彼此的承認，大國和平的物質基礎乃轉化成實際的和平局面，而且延續了百多年。本文以澶淵和平闡述了權力轉移理論與權力平衡理論可以併存，只是當爭霸戰爭開始後，兩大國之間需要國力維持均等，並透過多次無法壓倒對手的經驗學習，才會妥協議和。在結論中將澶淵之例運用到當前美中，而得出「在美中雙方遭遇成本巨大到足以改變對抗觀念的事件，而且決策者將這樣的事件歸因於雙方的對抗後，就有機會和解」，頗能以古鑒今。

第三篇歷史與國關的論文是朴炳培的〈敵對的朝貢體系：遼金與高麗關係〉，這是處理文化與權力的議題。通常學術界以朝鮮與明朝的關係做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朝貢關係的典型，並以此推論到中國在其他時代與其他國家的朝貢關係。然而朝貢關係是多樣性的，本文引入了「朝貢國的儒教規範約束」（朝貢國尊崇儒教且其統治者從中獲得了實質的政治利益）與「國際權力分配」（單極體系或多極體系）兩個變項，並由此推導出穩定性不一的朝貢關係。朝鮮與明朝的關係是在單極體系下而且朝鮮有極強的儒教規範約束，因此二者間的朝貢關係非常強韌。但是高麗與遼金之間的關係卻非如此，不僅體系多元（遼金與宋並列）而且高麗此時尚無朝鮮時代的高度儒教約束。由於遼金與高麗的地理位置毗鄰，前二者又各在一段時期掌握了東亞的軍事優勢（但尚非絕對），因此高麗接受了遼與金的先後冊封，這可以在現實主義的框架中加以理解。然而在另一方面，由於高麗與遼金之間沒有共享價值，高麗國王在國內的統治也沒有受到儒教的支撐與規範，因此高麗與遼金的朝貢關係中沒有共享價值，也缺乏韌性，一旦國際局勢發生改變高麗便向新的霸主尋求冊封，極爲靈活。本文對於朝貢關係從朝貢國的角度提出新解，發展出新的類型，並在高麗與遼金關係中找到與典型朝貢關係（明與朝鮮）的對立案例，進行細部檢視，具有很大的創新性。同時也將文化因素與權力因素並列，納入分析框架當中，是推展歷史與國關研究的好文。

本期的三篇歷史與國關論文分別從三個角度來補現實主義的不足，而將初始權力分配的外生變項納入分析框架（爲何是秦統一天下）、處理權力轉移下的均勢和平（澶淵之盟後的百年和平），並且探索了國際體系與儒教文化對於朝貢關係的影響（遼金與高麗間的朝貢體系）。這些論文不僅深化了我們對於前現代東亞國際關係的瞭解，推動了國關研究的理論前沿，更與當前世局緊密結合，指引我們去探索中國再起的內部根源、美中爭霸下的和平可能，以及各國與兩強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可以產生以古鑑今的效果，故而刊出與學術界及讀者大眾共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